莫礪鋒文集

卷三



凤凰出版社

莫礪鋒文集

卷三

古典文学论集（下）

凤凰出版社

目 次

古典文学论集（下）

《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 …… 3
《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 14
论宋诗的“以俗为雅”及其文化背景 …… 28
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 …… 43
论梅尧臣诗的平淡风格 …… 57
论北宋名臣韩琦的诗歌 …… 72
论王荆公体 …… 89
论苏轼在北宋诗坛上的代表性 …… 112
论苏诗的“奇趣” …… 146
苏诗札记 …… 161
论苏轼苏辙的唱和诗 …… 176
从苏诗苏词之异同看苏轼的以诗为词 …… 193
论清代苏轼研究的几个特点 …… 220
论纪批苏诗的特点与得失 …… 236
论苏黄对唐诗的态度 …… 257
论黄庭坚诗歌创作的三个阶段 …… 275
观念的溯源
——关于夺胎换骨说的首创者 …… 294

张耒诗歌三问 …… 311
郭祥正
——元祐诗坛的落伍者 …… 333
北宋末年的五首题《中兴颂》诗 …… 352
论陆游对儒家诗学精神的实践 …… 379
陆游诗歌中的学者自画像 …… 399
陆游“读书”诗的文学意味 …… 413
陆游诗歌中的生命意识 …… 427
陆游诗歌中的巴蜀情结 …… 440
论陆游写景诗的人文色彩 …… 456
论陆游诗自注的价值 …… 474
陆游“诗家三昧”辨 …… 493
读陆游《入蜀记》札记 …… 513
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 …… 532
论陆游杨万里的诗学歧异 …… 549
论杨万里诗风的转变过程 …… 567
从词坛背景看稼轩寿词的独特性 …… 584
从《瀛奎律髓》看方回的宋诗观 …… 598
论《红楼梦》诗词的女性意识 …… 616

古典文学论集（下）

《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与诗学思想

《唐宋诗醇》是清代乾隆年间出现的一部大型唐宋诗歌选集，它虽然题署为乾隆帝“御选”，但事实上只有所选六位诗人的名单是乾隆帝“御定”的，其他的编选评注工作皆出于卷首题名为“校对”的梁诗正、钱陈群与题名为“校刊”的陆宗楷、陈浩、孙人龙、张馨、徐堂等人之手，是一部乾隆朝馆阁文臣的集体著作。《唐宋诗醇》因充溢着由“御选”而产生的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从而长期不受学界注意，但是此书实是一部相当有特点的通代诗选，其编选宗旨和评注也颇见手眼，拟对之试作初探。

一

《唐宋诗醇》虽然是唐宋两代的诗选，但它却体现出较强的崇唐抑宋的观念。在乾隆帝眼中，本书仅仅是为了配合《唐宋文醇》而勉强编撰的。无怪乎在《唐宋文醇》中入选的唐代古文家有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四家，而宋代则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六家，乾隆帝且在序言中申明是对相沿已久的“唐宋八大家”的名单感到不满，故添入李、孙两位唐代作家，明显表示出要在两代之间谋求平衡的想法。而在《唐宋诗醇》中则不管平衡与否，在唐代诗人中入选了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四家，而在宋代诗人中却只选了苏轼、陆游两家。

崇唐抑宋的观念在此书的评注中也时时表现出来,例如卷四四陆游《五云门晚归》评曰:"以高韵胜,置盛唐人集中,不复可辨。"这一类评语在书中甚为常见,只要是苏、陆诗中的佳作,就往往评之曰"似唐",或"不逊唐",表面上似乎是赞扬这些宋诗,事实上却正是以唐诗的标准来衡量宋诗,言下之意是宋诗之佳者即在于它们像唐诗,而那些不像唐诗的宋诗就无足称道了。

在崇唐的前提下,《唐宋诗醇》更鲜明地体现出崇杜的倾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宋诗醇》最重要的编选宗旨就是崇尚杜诗。

首先,《唐宋诗醇》中各家入选篇目的数量如下表:

诗人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韩愈	苏轼	陆游
卷数	8	10	8	5	10	6
篇目数	375	722	363	103	541	561

在全书共二千六百六十五首诗的总篇幅中,杜甫一人就占了四分之一强!如果再考虑到各家作品的总数,那么杜甫入选诗数占其作品的总数一半以上,而其他各家的入选率只有李白稍微超过三分之一,而白居易则低至八分之一,陆游更低至十七分之一[①]!

其次,《唐宋诗醇》在评注中体现出强烈的崇杜倾向。由于它是一本"御选"的书,从忠君爱国的角度来崇扬杜甫是题中应有之义,此类评语不但大量出现在杜诗的评注中,也相当频繁地出现在其他各家的评注中,即使在李白诗中也不例外,如卷一《古风》的总评曰:"白以倜傥之才,遭谗被放,虽放浪江湖而忠君忧国之心未尝少忘。"这其实就是用杜甫的标准来评价李白,故貌似扬李,实为扬杜。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觉得此评不伦不类,但当时评者的意思多半是维护李白,也即把李白的人格意义揄扬到杜甫的高度。贯穿于全书的此类评语当

① 《唐宋诗醇》成书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其时李、杜等六家的诗作所存情形与现在相差不多,为免辞费,兹不细述。

然不可避免地散发出相当浓厚的封建说教气味，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付之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它在评论诗歌艺术时所体现的崇杜倾向，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第一是对杜诗自身的揄扬。对杜甫所擅长的诗体如五、七言古律体诗，《唐宋诗醇》都对其在诗史上的崇高地位作出充分的评价。例如卷一〇《北征》，评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有五言，不得不以此为大文字也。"又如卷一七《秋兴八首》，评曰："近体以七律为难。唐代名家，人不数首。……独至杜甫，天授神诣，造绝穷微，卓然为千古之冠。"即使是对于杜甫不甚擅长的诗体如七言绝句，此书也予以回护，如卷一五《绝句》（无数春笋满林生），评曰："老杜七言绝句，在盛唐中独创一格。论者多所訾议，云非正派。当由其才力横绝，偶为短韵，不免有蟠屈之象，正如骐骥骅骝，一日千里，捕鼠则不如狸狌，不足为甫病也。然其间无意求工而别有风致，不特《花卿》、《龟年》数首久推绝唱，即此诸作，何尝不风调致佳乎？"我们认为杜甫的七绝确有其独特之处，但是除了此评中提到的《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少数几首外，他的七绝与王昌龄、李白等七绝圣手的造诣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此评却一味地回护杜甫，甚至把杜甫不工于七绝说成是骏马"捕鼠不如狸狌"，这就很难说是公允之言了。当然，从总体上看，《唐宋诗醇》对杜诗的高度评价是符合事实的，而且它常常从诗歌史的角度来进行评判，颇有历史观念。

第二是在对其他诗人的评说中涉及杜甫。由于被入选的诗都是精选所得，所以在评语中不可能出现对该作品自身的贬责之语，于是此类评语通常都是称赞该诗接近杜诗的水准或受到杜诗的影响，这在陆游诗的评语中最为常见，例如卷四三《游三井观》，评曰："因画生慨，妙得子美家法。笔力朴坚，亦复相近。"需要指出的是，此类评语有时没有出现杜甫之名或杜诗的篇名，例如卷四四《忠州禹庙》，评曰："虽非'橘柚、龙蛇'之比，亦老气无敌。""橘柚、龙蛇"分明是指杜

诗《禹庙》的颔联"荒庭垂橘柚,古屋画龙蛇"而言[①],所以此评实际上即是说陆诗的水准差肩于杜甫。

综上所述,《唐宋诗醇》的编选宗旨中体现出强烈的宗杜倾向,这是它作为一种涵盖唐宋两代的通代诗选的最大特征。

二

《唐宋诗醇》的另外一个编选宗旨是强烈的思想倾向性。上文曾提到过此书对于忠君爱国的异乎寻常的强调,但除此之外,它的思想倾向还有多方面的体现。

首先,《唐宋诗醇》特别强调在诗作中所蕴含的政治教化意义。此类评语散见于各家诗集之中,尤其集中体现在白居易集中。先看其卷一九中对白诗的总评:"其与元微之书云:'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讽喻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澹而辞迁。'作诗指归具见于此。盖根柢六义之旨,而不失乎温厚和平之意。"其实本书对白居易自己所分的四类诗作中的感伤诗与杂律诗两大类也选录了不少,但对白诗的总评却只涉及讽喻诗与闲适诗两类,这显然是由于前面两类尤其是感伤诗一类与政治教化功能关系不大的缘故。这种诗评,几乎没有什么诗学价值,可说是此书评语的糟粕部分。

其次,《唐宋诗醇》虽然出现在文网尚未十分严密的乾隆前期,但是清廷对那些涉及君臣关系或满汉关系的文字已经相当敏感。这在此书的选目和评语中都有所体现,最明显的是关于杜诗的评注中涉及钱谦益注以及陆游诗的选目两点。

在《唐宋诗醇》的编撰时期,重要的杜诗清注本共有钱谦益注、朱鹤龄注、仇兆鳌注、浦起龙注四种。钱谦益其人,无论是诗文写作的

① 按:《禹庙》一诗亦选入本书,见卷一六,评语中且对其颔联大加赞赏:"'龙蛇、橘柚',宋人亦知其用本事,不知其妙在无迹。"

水平还是学术研究的水准，在明末清初无疑都是文坛上执牛耳的人物。但是由于他始则降清，终则与清廷貌合神离，所以终于引起了清廷的极大反感，从乾隆二十六年(1761)乾隆帝为沈德潜所撰《国朝诗别裁集》作序时斥钱谦益“不得为忠厚”开始[①]，到乾隆四十一年诏谕史馆“钱谦益反侧卑鄙，应入国史贰臣传”为极点[②]，对钱氏的口诛笔伐越来越严厉。而成书于乾隆十五年的《唐宋诗醇》中对于钱谦益的态度则远未达到后来的那种深恶痛绝的程度，值得我们注意。今检《唐宋诗醇》的杜诗部分，径引钱注的共有三十四处之多[③]，而其他三种杜诗清注即朱注、仇注和浦注在《唐宋诗醇》中被引用的数目则分别为二十四、四十六和二十八处。由此可见，《唐宋诗醇》对钱注是相当重视的，因为在清注四家中，只有仇注被引数高于钱注，如果考虑到仇注在康熙朝进于朝廷后曾得到康熙帝的嘉奖，所以乾隆时的馆臣一定要对它有所维护的事实，那么几乎可以说钱注是《唐宋诗醇》中最受重视的杜诗注本了[④]。不但如此，《唐宋诗醇》中还有引了钱注后还在本书的评语中对之加以赞扬的情形，例如卷一七《秋兴八首》的总评中就说：“钱谦益笺，十得八九，择其合者录之。余人尚有雌黄，抑亦不知量耳。”竟认为钱笺可算是《秋兴八首》的定评了。

然而《唐宋诗醇》也有对钱笺予以批驳的情形，例如下面这例就是严辞斥责：卷一三《收京》的评语说：“一喜一痛，忠爱之诚，蔼然而见，此始收京之作。钱谦益语语文致，喜为傅会，而不觉其以后释前为大谬也。”此类对钱注的指责都与杜诗的政治含义有关，尤其是针对钱注认为杜诗中有讽刺朝廷甚至君主的观点有关，所以与其说这反映了诗学观点的不同，不如说体现了馆臣们坚决维护封建秩序的

① 见《清史稿·沈德潜传》。

② 见《清史列传·钱谦益传》。

③ 按：本文的统计方法如下：如一题数首分别有注的，则分别计数；但如该注系对该题诗的整体而作的，则计作一处，下同。

④ 《唐宋诗醇》中也引及杜诗的几种宋注如赵次公注、黄鹤注及明末的王嗣奭注等，但数目都很少，可以不计。

态度。

在乾隆时期,各地的武装反清活动已经基本平息,清廷对汉族人民的防范、镇压也主要转移到思想文化方面。在乾隆后期编《四库全书》时,就曾乘机对历代典籍进行大规模的销毁、窜改,企图泯灭汉民族的民族意识。在《唐宋诗醇》中这种意图不像《四库全书》那样昭然若揭,但仍有蛛丝马迹可寻。在此书所选六位诗人中,作品的民族意识最为浓厚的当然首推陆游,而馆臣们对此也没有掉以轻心。第一,陆游诗作虽近万首,但是最能体现陆诗精神的应推他那些高扬爱国主题的黄钟大吕之声。可是在《唐宋诗醇》的入选篇目中,上述情况却不但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反而受到了有意识的掩盖。试看此类主题的名篇如《金错刀行》、《胡无人》、《夜读东京记》、《楼上醉歌》、《晓叹》、《关山月》、《战城南》、《秋兴》(成都城中秋夜长),竟然无一入选,恐怕不是出于疏忽,而是有意识的排斥。第二,《唐宋诗醇》中也选入了少量陆游的爱国诗作,但它尽量选取那些民族意识表现得不十分明显的作品。例如卷四二《观大散关图有感》,开头即说"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表达了抗敌复国的雄心壮志,但是其情感之激烈与辞气之激愤都不如《金错刀行》、《胡无人》等诗,所以还是入选本书,而且馆臣们还对它作出了"忠愤蟠郁,自然形见,无意于工而自工"的评语,即轻描淡写地赞扬其"忠愤",然后急忙转到艺术水准上来。至于陆游诗中时常涉及的夷夏之辨的意识,在本书的全部评语中当然是绝无踪影。

总而言之,《唐宋诗醇》的编选和评注中所体现的政治意识相当明显,它确实是一本忠实贯彻清廷统治意识的诗选,很符合其"御选"之名。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唐宋诗醇》毕竟是成书于乾隆前期的书,所以上述政治意识还不是非常强烈,要是它成书于乾隆后期的话,书中就不可能引用那么多的钱谦益之语,而陆游诗中的"胡"字恐怕也会被删削殆尽了。

三

那么，除了宗杜之外，《唐宋诗醇》还体现了哪些诗学思想呢？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诗醇》在唐宋两代的千百位诗人中精选出李、杜、白、韩、苏、陆六人，其中尤见手眼的是韩愈和陆游两人。让我们从此书对他们的总评说起。卷二七总评韩愈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其诗亦卓绝千古。论者常以文掩其诗，甚或谓于诗本无解处。夫唐人以诗名家者多，以文名家者少。谓韩文重于韩诗可也，直斥其诗为不工，则群儿之愚也。……夫六义肇兴，体裁斯别。言简而意赅，节短而韵长，含吐抑扬，虽重复其词，而弥有不尽之味，此风人之旨也。至于二《雅》三《颂》，铺陈终始，竭情尽致，义存乎扬厉而不病其夸，情迫于呼号而不嫌其激，其为体迥异于风，非特词有繁简，其意之隐显固殊焉。千古以来，宁有以少含蓄为《雅》、《颂》之病者乎？然则唐诗如王孟一派，源出于风，而愈则本之《雅》、《颂》，以大畅厥辞者也。"的确，对于韩文的成就，几乎是众无异辞的。然而说到韩诗，则是言人人殊了。正如此评所云，宋人对韩诗曾有过较多的贬斥之言。而此评则指明了韩诗本于《雅》、《颂》的性质，也即以铺陈其辞和直叙其事为主要手段的艺术特征，这当然与源出于《风》的王孟诗派那种兴象深婉、意在言外的诗风大异其趣。由于王孟诗风早已深入人心，而且整个盛唐诗风也是以王孟诗风为主导倾向的，所以当面目一新的韩诗骤然出现于诗坛后，人们就难免要诧为怪异甚至诋之为押韵之文了。可以说，《唐宋诗醇》的上述评语是历史上首次理直气壮地为韩诗张目的言论，它不但较准确地说出了韩诗的特征，而且把它提高到与《雅》、《颂》相承的高度来予以肯定。《唐宋诗醇》又进而论述韩诗的艺术成就说："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不减于李；其浑涵汪茫，千汇万状，诚不减于杜。而风骨峻嶒，腕力矫变，得李杜之神而不袭其貌，则又拔奇于二子之外，而自成一家。夫诗至足与李杜鼎

立,而论定犹有待于千载之后,甚矣诗道之难言也。"将韩诗评为可与李杜鼎立,言下之意是韩愈的造诣超过白居易,这就把韩诗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了。可以说,除了叶燮《原诗》之外,还没有出现过对韩诗作出如此高度评价的诗论,更不用说是诗选了。

《唐宋诗醇》对陆游的评语也很值得注意,卷四二陆游诗的总评说:"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栖农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咏歌,以寄其意。此与甫之诗何以异哉?"这段话言简意赅,对陆游的创作过程及其创作特点作了深刻而又生动的论述:陆游虽然享年甚永,但是就其诗歌创作而言,确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而其间最重要的又首推他"浮沉中外"的时期,即自四十六岁入蜀从军至六十五岁被劾罢官的二十年,陆游将自己的诗集名为《剑南诗稿》,就表明了对其"在蜀之日"即从军南郑的那段经历的重视,因为那是奠定陆诗的基调和成就的关键时期。此评还将陆诗的内容归结为两个主要方面,前者为"忠君爱国之诚"也即爱国主题,后者则是对日常生活内容的吟咏。"渔舟樵径,茶碗炉熏"几句话说得极好,因为在数量上占压倒多数的陆诗,尤其是其晚期诗确实是以这些内容为主要对象的。此段总评还对陆诗篇目繁富的情形作了评说:"诗至万首,瑕瑜互见。评者以为譬之深山大泽,包含者多,不暇剪除荡涤。非如守半亩之宫,一木一石,可屈指计数,可谓知言矣。若捐疵颣,存英华,略纤巧可喜之词,而发其闳深微妙之指,何尝不与李杜韩白诸家异曲而同工,可以配东坡而无愧者哉?"的确,由于《剑南诗稿》卷二〇以后的陆诗未曾经过作者删订,而陆游作诗又特勤,所以现存陆诗确有篇目过于繁富且良莠不齐的情况。《唐宋诗醇》并未回避此点,但它指出这对陆诗来说瑕不掩瑜,可谓卓见。

对于本书只选六家的理由,《唐宋诗醇》卷首的《凡例》中亦有补充性质的交代:"唐宋人以诗鸣者,指不胜屈。其卓然名家者犹不减

数十人。兹独取六家者，谓惟此足称大家也。大家与名家，犹大将与名将，其体段正自不同。李杜一时瑜亮，固千古希有。若唐之配白者有元，宋之继苏者有黄，在当日亦几角立争雄。而百世论定，则微之有浮华而无忠爱，鲁直多生涩而少浑成，其视白苏较逊。退之虽以文为诗，要其志在直追李杜，实能拔奇于李杜之外。务观包含宏大，亦犹唐有乐天。然则骚坛之大将旗鼓，舍此何适矣。”元稹的成就远逊于白居易，当然不可能入选本书，可以不论。但黄庭坚在宋代诗坛上的地位却是相当重要的，他在生前就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后人无论是称扬宋诗还是指责宋诗，也常常苏黄并称，这几乎已经成为定论了。然而《唐宋诗醇》却力排众议，毅然舍黄庭坚而取陆游，这是颇有气魄的。虽说“鲁直多生涩而少浑成”一语并不全面，但确实说中了部分黄诗的弊病。应该说，《唐宋诗醇》把韩愈和陆游选入唐宋诗史上的六大家之列，是此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它表明了编选者具有独特的文学史眼光。

四

最后讨论一下《唐宋诗醇》的学术水准。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唐宋诗醇》成于众人之手，虽然全书总的编选宗旨并无歧异，但是散见于各家诗的评注中有无不尽一致乃至互相矛盾的地方呢？应该说，此书在定稿时肯定经过一番整合的工作，所以全书基本上是互相协调的，例如卷一三杜甫《春日忆李白》，评曰：“李杜交谊，于白集中论之详矣。”这显然是因为李集在前，所以有关李杜交谊的情形就在李诗的评注中先予论及了。但是这个整合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好，所以书中仍然留下了一些出于众手的蛛丝马迹，例如卷二九韩诗《郑群赠簟》，评曰：“婕妤《怨歌》云：‘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此云‘却愿天日恒炎曦’，同一语妙。”而对韩诗最精妙之处即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来形容此簟之佳则没有涉及，可谓失

之毫厘[①]。可是在卷三八苏诗《寄蕲簟与蒲传正》的评语中却指出："昔郑群当暑湿之时赠簟与昌黎，而韩诗有'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之句，妙想独透。此则当春寒之候，寄簟与传正，乃云'皇天何时反炎燠，愧此八尺黄琉璃'，命笔略同。然一则美其适用，一则愧其无用。虽脱胎，仍是翻案也。"此评对韩诗的立意之妙有很清楚的认识，并指出苏诗与它的沿革关系，很具手眼。这就相当令人怀疑上述韩诗与苏诗的评语是出于二人之手，而最后统稿时未及予以协调。

更明显的痕迹在于各家诗的评语水准不一。我的印象是，此书中六家诗的评语中，以白诗的评语质量最低，与其他各家有明显的差距。且不说白诗评语中不时出现的迂腐之见，就是单论艺术分析而言，它也较少真知灼见，而较多模糊影响之谈，甚至有不少偏颇之见。例如卷二一《渭村雨归》，评曰："意致简远，极似韦应物。"其实此诗虽能写荒远寂寥之景，但是与韦诗的简淡高远之境尚隔一层。甚至在注释中也有注白诗欠佳的情形，如卷二一《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注中竟全引白氏《庐山草堂记》，又如卷二二《长恨歌》，注中竟全文引用陈鸿《长恨歌传》，这种繁冗的注释方式在其他各家诗中都未出现过，是全书体例不一的明显表现。

总的说来，《唐宋诗醇》中对作品的评语撮合转述前人之意的较多，而有所发明的不多见。其中最不惬人意的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评语，例如卷二九韩诗《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评曰："东坡所谓能开衡山之云者本此。"这是指苏轼的"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之语而说的[②]，但这种评语实在没有什么诗学意义。也许正因如此，当《唐宋诗醇》的编者自觉有独得之见时，就往往不惜

① 按沈德潜《说诗晬语》中评此诗曰："'却愿天日恒炎曦'与'携来当昼不得卧'，俱透过一层法。"所谓"透过一层法"，意即极度夸张之意，这的确是韩诗最值得注意之处。《唐宋诗醇》中已引了沈语，却未能在本书的评语中申述之。

② 见《潮州韩文公庙碑》，《苏轼文集》卷一七。